



瞿秋白案复查散记
一生多变章士钊
亦学亦官胡乔木
△团肃反之『法理』依据
与文化根源
民国反贪何以失败
『六呼万岁』别解

书香人多姿

陈铁健/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湖南大学图书馆ZS0873016

书香人多姿

陈铁健/著

K250.7
5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人多姿 / 陈铁健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

(书与人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208 - 3

I. ①书…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现代 - 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0315 号

· 书与人丛书 ·

书香人多姿

著 者 / 陈铁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子光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班建武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6.875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166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208 - 3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九十三岁的吴（江）老，前一阵打来几次电话，问我对史学理论和当代史学史研究有无兴趣，我说，1980年代曾经参加几次史学理论学术会议。那时思想开放，学风活跃，学者百无禁忌，议论风生；史学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校正史坛弊病，与会者受益良多。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样的会已很少见。素与理论隔膜的我，也就退避三舍，不再与会了。吴老说，应该对当代史学史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你参与吗？我说，曾经写过一些就事论事的纠错文字，但对变化莫测的理论一贯兴味索然，敬而远之。

我向吴老推荐瞿林东、蒋大椿两位史论家。吴老后来说，已与瞿林东联络，收到瞿送来的不少书刊，称赞瞿是一位史学理论专家。蒋大椿说，他12月初到台湾讲学，两个月返京后再去拜望吴老聆教。回来后，他送去一些书文并与吴老畅谈。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侧重革命史、民国史。根据专业特点，我的治史理念很简单：厘清史实，除伪复真，摆脱党派斗争

格局，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牢靠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何况，变来变去的理论风云，让人无所适从呢。

历史家论人叙事，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不作片面偏颇之论。叙事，须由史料引出结论，而非先有结论再选配史料，合者留，不合者去，以圆其说；论人，不因其为伟人而为其所慑。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藐之，并不是不恭，而是把伟人还原为凡人，不是高不可攀，匍匐在地，顶礼膜拜。

百家争鸣之倡，始于1950年代，至今未臻佳境，因而呼声不断。繁荣文化，振兴学术，端赖争鸣实现，而非防堵封杀不同见解。一旦认为绝对真理在握，就会轻率宣称终极业已达致，百家争鸣便会变成一家独鸣，剩下的事便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压制思想自由和空间，势必将学术园地荒芜化。近年所写文字，多以辨伪求真、质疑重估为职志，愿呈奉于读者面前供指教。

陈铁健七十又七，辛卯春日写于京南亦庄水东书屋

目录

与历史结缘——《绿竹水南集·自序》	001
附：陈铁健：吾以吾心对历史	008
诚信与信史——《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总序	013
“扩拓万古心胸”——读《陈独秀著作选编》	017
附：对《陈独秀研究简报》的建议	023
瞿秋白与列宁主义传播	025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心路历程	035
瞿秋白被捕时间考辩	043
最早悼念瞿秋白的《殉国烈士瞿秋白》	049
瞿秋白案复查散记	053
一生多变章士钊	064
她永远美丽——《宋庆龄的后半生》读后	076
观史犹忆阎宝航	083
洞察历史的深刻	086
送李新先生远行	091
亦学亦官胡乔木	106
怀念郑惠	113
悼蔡德金	119

马连儒周年祭	124
“谷底”论辨析	128
启蒙三人行	134
中国大革命成败之议	138
出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研究	141
AB 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 团与 富田事变始末》札记	144
听之而已 信则未必——《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 张学良》读后	161
再说听之而已信则未必——答《对辩误的辩误》	169
附：对辩误的辩误	172
少帅研究新看点——《张学良史事笺证》书后	176
国军有一个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181
莫使丰碑成陋碑——《永远的丰碑》正误	183
民国反贪何以失败	186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一本新书的社会主义 新论	188
《“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	192
杨劲桦与《梦回沙河》	195
“六呼万岁”别解	200
九游周庄之后	203
自然·自信·自我心象——殷延国和他的治印观	207
后 记	210

与历史结缘

——《绿竹水南集·自序》

北京东直门外胡家园 15 号楼 3 层，北窗开阔，面对着 50 米外的亮马河。河对岸是一片绿荫下的农家平房。在亮马河水之南的这个居所，我一住就已 15 年。从 1987 年秋迁入始，书房便由原住城内弓弦胡同 8 号寓所的“绿竹书屋”改作“水南斋”。绿竹书屋，得名于弓弦寓所窗前满布着我莳养的罗汉竹、青竹、翠竹、观音竹、墨竹等大小盆栽为主兼有其他花卉的那个狭长的小院。绿竹的劲节、虚心、生机盎然，至今不能忘怀。我在那里从 1965 年住到 1987 年，整整 22 年。其间有被“文革”乱世浪费的 10 年，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发奋弥补的 10 年。《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传》、《论西路军》等，都写于此期。1987 年后所写蒋介石、陈独秀、王希天、黎澍诸文，史学随笔杂感，以及所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 卷）等，皆成稿于水南斋。本书名曰《绿竹水南集》，盖源于此。

文史不分家，自古已然。我是一个历史癖，也是一个文学癖。

两者相较，文学癖曾经重于历史癖。1942年，小学二年级，我从父母亲的书柜里找到一本《江湖奇侠传》，从此嗜读武侠小说，一发不可收。寒暑假时多与长我三岁的舅舅厮守嬉戏。舅舅不喜欢读书，外祖母便叫我从书摊租来武侠小说。每天给她念个把钟点，那是她在操持家务的忙碌中最安详适意的时刻。夜晚入睡前，躺在被窝里，紧挨着外祖父听他讲《三国》、《水浒》和《封神》故事，兴未尽，已入梦。每天一段，数十天的假期，可以听完一两部书。此后，在与舅舅游戏中，便增加了“战马超”、“伐东吴”等追逐争斗的场面。初中时，我先后读过两地三校，除在校内图书馆借阅文学书籍，还到市区图书馆找书读。有时放学后跑到书店站在书架前读到关店时。《万有文库》的不少书，就是在一家旧书店里这样读完的。父亲一度在书店做事，他经常把新书拿回家我包好书皮连夜读完，第二天他再送回书店。每逢暑假，父亲会从他机关图书室借一批中外文学作品，供我假期阅读。1950年暑假，我读过的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大抵都有读书札记。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寒假之前我已考入高中，但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氛围中，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准军事性的政法部门学习、工作凡五年，直到1955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五年中所读之书，历史学著作始终居于前列，这是我进入史学之门的初步。

涉世日深，所遭遇的现实种种困惑，没有人能够做出令我满意的回答，只好向书本讨教。在作家编织的故事中，或史家撰写的史籍中索解求证。于是，经史子集，古今说部，都找来浏览。虽则“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却使我从爱好文学转而钟爱史学，从欣赏文学的浪漫张扬转入对史学严谨真实的追求。读史愈多，研史愈久，愈益感知史学令人清醒透彻，不甘于愚昧盲从。心中

悬有史镜，以古人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之行事，听其言复观其行，便不会轻易受舆论误导，不会为一己私利而趋从权威，不会人云亦云而忘记独立思考。

1958年，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吉林省新设历史研究所，从我们年级调去几位同学，张旋如、田锡国和我都在其内。1958~1961年，我被分配研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先后在哈尔滨、大连、北京等地访录当事人和知情者，如周保中、冯仲云、刘澜波、李实、赵毅敏、何成湘、马辉之、钟子云、冯弦、王效明……在中央档案馆复制满洲省委文件，阅抄日伪战犯案卷。三年中所接触的人物和资料，使我对地处东北一隅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艰苦奋斗业绩有所了解，也对东北党内和抗日联军内激烈残酷的内斗深感震惊，许多精英未曾牺牲于对敌斗争而死于无休止的党内军内的自相残杀。后来当我研究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在党内被整肃的遭遇时，我便逐渐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未必你死我活（大汉奸、大战犯可受礼遇，可为高官，即为一证），而所谓党内路线斗争有时却残酷到必置对手于死地而后止（博古临时中央之对瞿秋白，西路军败后延安中央之对李特、黄超，“文革”时期党主席之对国家主席，等等）。也许可以说这是研习历史给我带来的启示。

1961年冬季，我在北京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日夜阅抄日伪战犯案卷。每逢周末，在近代史所进修的学友李义彬都邀我进城小聚。他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原黎（元洪）大德堂东山八角亭。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就是我的临时客床。何干之、李新、孙思白、陈旭麓、彭明都在亭畔一排平房中设有工作室。活跃健谈待人亲切的彭明先生，不时到八角亭聊天。他说编书需人，建议我来京边进修边做事。我征得吉林历史所佟冬、万九河两位所长同意，

1962年2月底即来北京进修。李新师正在助吴老玉章撰写回忆录，要我为他收集历史背景资料。半年过后，李新师建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考取之后，吉林方面坚不放人。那时粮油管制甚严，无户口即无油票供应，食堂拒绝入伙。从9月到12月间，我买了一张公交车月票，午、晚两餐几乎跑遍周围十里方圆的饭铺，以当时食界仅有的咸菜炒黄豆、无油青菜汤和黑面火烧充饥。义彬每月购物本上仅有二两熟肉，总是由我和他分享，一两肉两口便吞下去，尚不知肉味为何。苦则苦矣，精神上却是愉悦的。近代史所的丰富藏书和学术氛围，编书组诸位师长的深厚学识和谆谆善诱，使我如坐春风，日有长进。这种美好的岁月，一直延续到1964年秋天，远赴张掖参加“四清”运动之前。其间，虽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喧嚣，但对在良好的小环境中闭门读书的我来说，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只是在看到戚本禹著文恶意攻击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论著后，我以打抱不平的心理，向《光明日报》投寄一篇长文反驳戚氏谬论。此文加上1966年所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一案，被“文革”中夺权的造反派大作文章，把我列入“清理阶级队伍”名单，并向政法部门送上一纸诉状，给我戴上“孝子贤孙”、“保皇派”、“反对陈伯达”等等罪名。如果不是他们很快垮台，我是要被“清理”一番的。

从青年到中年，悠悠沧桑之变中，我先是受益于大学时期的李时岳先生。他以其对于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中的违抗流俗的见解，使我从大学毕业后能够不囿于流行的理论观点，而注重观察历史真相。随后，我更受益于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新先生，和虽非直接授业却对我热心关照具体指导的黎澍先生。李新师是从四川走出的学生领袖，经历过延安时期，是穿过军装打过游击的老

革命兼教授，而湖南籍的黎澍师则是身着西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化战士和学者。他们两人共同的人生信条是：斥教条，去盲从，反专制，争民主，倡言改革开放，崇尚自由独立。他们清贫一生，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威所屈，敢想、敢言、敢作、敢为。我有这样的师长而心存自豪，无比荣幸。我也试图以他们的言行为楷模，身体力行，并且自信学有所用。我于1958年起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职守，吃史学饭四十余年，所写文字均不离史事、史人、史论，而以写真实的事与真实的人为主旨，素来与理论隔膜，对数十年间变幻莫测的理论风云往往敬而远之。窃以为史学重实证，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可以留存，而没有真正的史实，再高妙的理论也无济于事，只能束之高阁。2000年辞世的艺术史家、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哈斯科尔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可我读到他的言论已是2001年，也许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吧。

史学不以理论为重，却不能拒绝思索；思索，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重要。富有活力的思想是史学进步的动力，而理论往往冻结思想的活力使之僵化，成为史学进步的障碍。专制者要人们迷信，而压制人们思索；被专制者因性格扭曲，而不善于甚至不敢于思索。抑塞不拔，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心存恐惧，是已逝去的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征。然而，知识分子总是要思索，要探究，不肯在屈辱和无奈中神亡心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幼时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北，童稚未脱，看到小朋友玩的图片中有身背大刀的中国士兵站在长城上吹起号角，我不能不问母亲：我们是“满洲国”国民吗？母亲悄声的回答，使我知道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20世纪50年代初，对“老大哥”苏联颂

声不断时，我总忘不了1945年光复后苏联军队在东北地区的种种丑行。其后，当我被批评对“右派分子”温情、右倾，不得不紧跟反右时，我总在想，那位战略家的“阳谋”是高明还是可鄙？当几千万中国人被人为的大饥馑变成饿殍之时，我不能不怀疑一些操纵亿万人命运的高官的治国能力。在我心中，曾经感动过我的那个“战无不胜”的神话，已经不攻自破。当“文革”灾难降临到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头上，数千年积累的文明遗产、文化宝藏被砸烂烧毁的时候，你还会相信它的发动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我还记得，1953年斯大林逝世，当夜空中哀乐弥漫时，许多人动情地流下眼泪；到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在不少人心中斯大林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经过多少次这样的心灵震颤，人们能不重新思索？所以，当某位把折腾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造成种种本来不应出现的巨大灾难的伟人逝世，许多人不再为他流泪。他的遗骸留置处，虽然巍峨崇高，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乐意前往顶礼膜拜的了。历史是最好的教师，它会让人看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感悟，趋于理性，才会摆脱迷信，拒绝盲从，独立思考，不为党派所囿，不为教条所惑，不为权势所屈。

当然，理性不是万能的。中国的实用理性思维，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革命盛行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宏大庆典；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在自视为终极真理的指挥下，在非白即黑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误导下，中国人所饱受的人间苦难、思想压抑、精神屈辱，绝不小于上半个世纪。仅仅“文革”十年，就是史无前例的浩劫，遑论其他？近二十年在力求实现现代化并在物质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在文化现代化方面却不能不承继政治革命思想过分发达、人文思想相当贫乏和苍白的事实。在下的文章，

自然不能免俗，不无贫乏与苍白的影子。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包括我自己）要在新世纪重振科学精神保持学术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屈指算来，再过两年，在下就将年满七十。号称古稀，实则今天看来不过是还能折腾一阵子的“青年老头”。倘不生意外，且手可动、脑可思，生活闲适，心情沉稳，在下将会继续爬格子。不囿于环境，不看人脸色，力戒附庸趋时，扫尽贫乏苍白，写自己想写、乐意写的文字，日有所读，月有所写，岁有所成，则于愿足矣。

附：陈铁健：吾以吾心对历史

记者 陈香

我已然很长时间不会激动。然则，当面对一些一生历经沧桑、迭遭变故甚至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的老学者时，我却总有放声一哭的冲动。因为，即使不乏伤心切肤之痛，他们也把一切轻轻抹去，以信念、醒悟和批评，重把自己放在学术清贫和寂寞的祭坛上，九死而未悔。这一次，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年近七旬的陈铁健先生。

苍苍者天，悠悠者地，吾以吾心养吾浩然之气。血泪凝成真精神，唯此，学术才可代代传承。“有些人不理解我。”“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先生说到伤心处，亦为之黯然。不管是为人还是做学问，真诚总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大多执著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常有力不从心之叹。悠悠我心，昭昭可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记者：首先，祝贺您的《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出版。诚如您书中所言,中国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的道路上坎坷多难。那么,是什么让您置自己的“伤心切肤之痛”于不顾,始终要对近代史学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陈:近代史学研究是很尴尬的。时未久远,必然有为尊者讳之处。我说,这个事我来做吧,我来说真话。这不是为了什么,仅仅是本着研究者的良心,要使历史学成为真科学而非伪科学。从青年到中年,我先是受益于大学时期的李时岳先生。他以其对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中的违抗流俗的见解,使我注意观察历史真相。随后,我受益于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李新先生和虽非直接受业却对我热心关照具体指导的黎澍先生。李新师是从四川走出、到延安的学生领袖,黎澍师则是身着西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文化战士和学者。他们的人生信条俱是:斥教条,去盲从,反专制,争民主,倡言改革开放,崇尚自由独立。他们清贫一生,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威所屈。我也力求以他们的言行楷模,身体力行,并自信学有所用。

记者:是的。您一直孜孜以求历史细节的真实,不断思考一些曾被绝对化的史学定论。可是,死者长已矣,历史已成为过去,又何必重揭历史的疮疤?

陈:历史就是要计较细节的真实。一件小事往往关乎整段历史的发展。伪造历史,往往是为了现实中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确,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再走一遍,然则,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是为了认识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路。不吸取历史教训,现在的错误可能就是过去错误的延续。明明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净化历史并非否定一切,而是排除坏的种种,保留好的种种,从而摆脱危机,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富足,思

想行动自由。读史愈多，研史愈久，就愈知史学之功在乎令人清醒明澈，不甘于轻信盲从。心中悬有史镜，以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之行事，便不会为一己之私利而趋从权威，不会人云亦云忘记思考。

记者：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福柯就曾说过，用权力解读历史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陈：的确，历史，往往由隔代来做，由胜利者修前代的历史，因而，历史往往成为胜利者的宣传。但作为研究者，就要尽量做出公允的评价，应该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来看历史。学者在占有大量的确凿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揭示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无疑会对领导者决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拒绝真实的历史借鉴，接受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非历史借鉴，对作为一位对现实负责同时也应该更有勇气对历史负责的现代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不明智的。人们会从而为政者正视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坚定态度中，得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强信心和鼓舞力量。

记者：我记得您书中提到，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那么，您可否告诉广大的青少年朋友，您是否认为这也是为人立身的根本之道？

陈：历史家作为具有良知、传承文明、维护真理的知识分子，应该摆脱长期以来在派别斗争中形成的非好即坏、非美即丑的简单思维方式，纠正那种“成王败寇”的传统落后的思想方法，抛弃顺风说话的扭曲的文化性格，用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文字，使人们领略和尊重白纸黑字的力量。否则。当后人论及历史是非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所遗留的历史的伪作是难逃被嘲弄的命运。真诚，是我所孜孜追求的为人立身之道。我追求真诚，待人要真诚，对自己也真诚；但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青少年，他们要